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家庭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幸福感*

——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

任洪杰¹, 李辉尚¹, 胡晨沛², 冯祎宇³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业大数据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1;

2.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3. 贵州大学, 贵阳 550025)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正在加速向老年群体渗透, 潜移默化地影响老年人生活方式、行为认知和情感体验, 并对其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 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数据, 对 6081 个老年人样本的幸福感水平进行刻画, 检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路径。结果显示: (1) 互联网使用显著正向促进老年人幸福感水平。 (2) 家庭代际支持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其中来自子女的情感慰藉及经济赡养能够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而日常照料因互联网使用而减少, 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建议进一步推动互联网在老年群体的普及率, 提升智慧养老助老水平, 切实发挥互联网在家庭代际支持中的正向作用, 持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

关键词: 互联网使用; 家庭代际支持; 老年人; 幸福感;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4)04-0341-06

1 引言

为人民群众谋幸福, 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实现老有所养, 持续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 更是国家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和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上持续用力”。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幸福感, 已经成为国内外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从全球来看, 人口老龄化是大势所趋, 联合国 2022 年人口展望报告显示, 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从 2022 年的百分之十增长至 2050 年的百分之十六; 与此同时,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持续提高, 全国人均寿命明显提高, 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比呈双增长态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1 年全国 60 岁以上人口达到 2.67 亿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18.9%, 其中 65 岁以上人口达到 20056 万

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14.2%, 老龄化和老年群体高龄化态势明显、形势严峻 (倪晨旭, 王震, 2022)。这就意味着必须针对养老方式有所创新、持续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基于网络的智慧养老等新模式应运而生。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 要加快“互联网+养老服务”, 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精准对接养老服务需求, 促进养老方式的转型升级。近年来, 我国信息化水平快速提高, 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73%, 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60 岁及以上老年网民高达 1.19 亿, 占全体网民比例的 11.5% (李竞博, 李怡, 2024), 互联网的普及正在加快改变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也改变着老年人的情感体验, 影响着老年人的幸福感。已有研究认为, 互联网使用能够增加老年人的健康知识, 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 (Yuan, 2021), 通过影响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而影响其幸福感, 且家庭状况越好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概率越高 (温勇, 丁雨桥, 2022)。

与此同时, 在传统孝道文化影响下, 亲代在中国家庭中具有重要地位, 随着其身体机能弱化, 子代承担起赡养责任, 并给予亲代家庭代际支持, 呈现“反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207313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2ATJ004), 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 (CAAS-AII-2016),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JBYW-AII-2022-10, JBYW-AII-2021-41)。

通信作者: 李辉尚, E-mail: lihuishang@caas.cn。

馈模式”。子代对亲代的家庭代际支持主要包括精神慰藉、经济赡养和生活照料三方面(张敏杰, 1994), 这种家庭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幸福感水平密切相关(贺志峰, 2011; Cong & Silverstein, 2008)。作为获得供养的传统方式, 融洽的家庭代际支持可以帮助老年人排解孤独、抑郁情绪, 深刻影响其幸福体验(聂建亮, 2018; 吕如敏, 赵瑞芳, 2015; 许新鹏, 2017)。然而, 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 人口的城乡流动使得子代与亲代空间距离拉大, 子代与父代居住分离阻断了代际之间交流的随时性, 导致子女无法对老年父母提供及时、持续的生活照料及情感慰藉(蔡蒙, 2006; 田北海, 徐杨, 2020), 制约了经济方面的家庭养老资源获得可能性(宋璐, 李树茁, 2008), 最终致使家庭代际支持弱化或减少(舒玢玢, 同钰莹, 2017), 加重老年人孤独感和失落感(Adhikari et al., 2011), 冲击着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因此,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探究互联网使用、家庭代际支持及老年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尽管已有文献围绕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较为丰富的研究, 但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 与老年人幸福感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同时, 互联网越来越融入老年人日常生活, 其对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的作用程度及其机制尚不明确; 而家庭结构少子化、养老社会化使得家庭代际支持弱化现象日趋明显, 其在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幸福感作用机制中扮演何种角色?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基于此, 该研究利用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 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探究家庭代际支持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研究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8 年的全国调查数据, 该调查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开展, 主要收集国内 45 岁以上中老年人个人、家庭的收入及资产、劳动供给与退休、医疗保险与保健、家庭经济往来等信息, 能够满足与老龄化相关的研究需要。全国基线调研于 2011 年展开, 在此基础上于 2013、2015 和 2018 开展了三轮全国追踪调查。该研究选取 2018 年数据是因为 2018 年数据作为数据库最新年份数据(该研究开始时), 对于该研究最具代表性且能真实反映在数字经济时代,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2018 年“银发”群体陆续“触网”, 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数量飞速上升, 且老年人互联网体

验日渐立体全面, 涉及功能更加广泛, 其普及加快改变着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也改变着老年人的情感体验, 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幸福感。而 2011 ~ 2015 年, 互联网尚未在老年人群中普及, 互联网助力老年人幸福感的潜力尚未发挥(2015 年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仅占总样本的 3.18%, 这与 2015 年由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人数占比基本相当, 为 3.9%; 2013 年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仅占总样本的 1.58%, 这与 2013 年由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人数占比基本相当, 为 2.0%)。该研究选取 2018 年调研数据, 按照老年的年龄标准, 筛选了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的样本进行分析研究, 有效样本为 6081 个。

2.2 变量

2.2.1 老年人幸福感

由于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 难以全面测量, 因此在以往研究中往往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幸福感的量化指标, 例如在 CHARLS 问卷中, “总体来看, 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的问题设置测度了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邢占军, 2011)。但单一测量方式容易因受访者当天情绪波动等原因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情绪化评价, 导致测量误差(罗明忠, 刘子玉, 2022), 为此, 本文采用多维度指标构建幸福感变量。具体到 CHARLS 问卷, 包括以下问题: (1) 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 (2) 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 (3) 我感到情绪低落? (4) 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 (5)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6) 我感到害怕? (7) 我的睡眠不好? (8) 我很愉快? (9) 我感到孤独? (10) 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每个题目对应四个选项, 对这些选项赋值, 快乐感越高得分越高, 如问题: “我感到情绪低落”, 选择“大多数的时间”赋值为 1, 选择“很少或者根本没有”, 赋值为 4, 将十个选项得分数值相加并取均值, 数值越大代表越快乐, 取均值后的数据得分最高为 4, 最低为 1(黄文杰, 吕康银, 2020)。在该研究中, 幸福感各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1。

2.2.2 互联网使用

依据受访者对问卷中对“您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可多选)”的回答来度量。选择“上网”的赋值为 1, 视为使用互联网, 选择其他选项的赋值为 0, 视为未使用互联网。

2.2.3 家庭代际支持

家庭代际支持指家庭父辈和子代在经济上的往来、生活上的互助和情感上的支持情况, 以及共同分享生活体验和资源的全过程(张敏杰, 1994)。根据

既有研究(聂建亮,2018;侯建明等,2021),结合 CHARLS 问卷数据的可得性,选取的具体指标如下,(1)情感慰藉,本文用父母与子女联系频率衡量,将每周至少联系 1 次视为与子女感情亲密。该问题共涉及 9 个子女,只要老人与其中任何一个子女每周至少联系一次,则认为老年人得到子女情感慰藉,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2)经济赡养,本文对所有子女给予的经济赡养进行加总后取对数。(3)生活照料,生活照料在 CHARLS 问卷中的表述为:“如果以后您在日常生活方面需要照顾,比如吃饭,穿衣,有亲人或朋友能长期照顾您吗?请问他/她是您的什么人?”,将照料人为子女、儿媳/女婿、孙子女/外孙子女赋值为 1,其他赋值为 0(唐金泉,2016;王积超,方万婷,2018)。

2.2.4 控制变量

通过梳理文献可知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居住地区也会对老年人幸福感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对老年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自评健康、收入、居住地区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加以控制。其中,性别为二分类变量,“女性”设置为 0,“男性”设置为 1;年龄即为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年龄;婚姻状况为二分类变量,“无配偶”设置为 0,“有配偶”设置为 1;自评健康为多分类变量,健康状况“非常不好”设置为 1,“不好”设置为 2,“一般”设置为 3,“好”设置为 4,“很好”设置为 5;收入为个人年收入的数值之比;居住地区为二分类变量,“农村”设置为 0;“城镇”设

置为 1。

2.3 研究程序

删除无效数据后,使用统计软件 SPSS 22.0 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使用 Stata16.0 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研究中如果同源方差严重,则该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也会受到质疑。由于在研究中的变量数据都是同一个被试报告,共同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CM)容易存在,故参考现有文献,对所有变量进行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发现,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8.44% (<40%),初步说明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使用 SPSS 22.0 软件对互联网使用、老年人幸福感、家庭代际支持及各控制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测,检验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知,老年人幸福感均值为 2.99,表明样本中老年人幸福感较高。且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幸福感($r=0.16, p<0.001$)、情感慰藉($r=0.04, p<0.001$)、经济赡养成显著正相关($r=0.12, p<0.001$),这些结果为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作用效应、家庭代际支持的中介作用等提供了必要基础。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n=6081$)

	<i>M</i>	<i>SD</i>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老年人幸福感	2.99	0.73	1.00										
2. 互联网使用	0.07	0.25	0.16***	1.00									
3. 性别	0.51	0.50	0.20***	0.06***	1.00								
4. 年龄	69.24	6.82	-0.07***	-0.12***	-0.01	1.00							
5. 婚姻状况	0.69	0.46	0.14***	0.08***	0.25***	-0.31***	1.00						
6. 自评健康	2.92	1.01	0.38***	0.09***	0.07***	-0.04***	0.04***	1.00					
7. 收入	7.14	3.08	0.18***	0.18***	0.12***	0.07***	0.06***	0.09***	1.00				
8. 居住地区	0.40	0.49	0.18***	0.21***	-0.05***	0.02	0.002	0.10***	0.29***	1.00			
9. 情感慰藉	0.45	0.50	0.05***	0.04***	0.02	-0.07***	0.11***	0.002	-0.006	-0.07***	1.00		
10. 经济赡养	7.90	1.37	0.13***	0.12***	0.04***	-0.02	0.10***	0.05***	0.09***	0.10***	0.23***	1.00	
11. 生活照料	0.84	0.37	0.02	-0.09***	-0.13***	0.06***	-0.18***	0.11***	-0.09***	-0.09***	-0.004	-0.02	1.00

注: * $p<0.05$, ** $p<0.01$, *** $p<0.001$,下同。

3.3 中介效应检验

家庭代际支持包括情感慰藉、经济赡养和生活照料三个维度,接下来使用 Stata16.0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控制个体特征居住地区后分析三者在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幸福感中的作用。

由表 2(1)的估计结果可知,互联网使用对老年

人获得情感慰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0.09, p<0.001$)。其次,由表 2(2)的结果可知,通过引入情感慰藉变量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仍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0.19, p<0.001$),且情感慰藉对老年人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beta=0.07, p<0.001$)。可能的原因是,老年人将网络作为与子女

日常沟通的互动工具,有助于其与子女的日常情感交流,最终实现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

由表 2(3)可知,互联网使用显著正向促进老年人获得的子女经济赡养($\beta = 0.51, p < 0.001$)。其次,由表 2(4)的结果可知,通过引入经济赡养这一变量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eta = 0.17, p < 0.001$),其经济赡养对老年人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04, p < 0.001$)。这可能是由于互联网改变了过去相对封闭的支付模式,便捷的转移支付手段让老年人享受更多来自子

女的经济赡养,进而提升其幸福感。

由表 2(5)估计结果可知,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获得生活照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beta = -0.10, p < 0.001$)。其次,由表 2(6)的结果可知,通过引入生活照料变量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仍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21, p < 0.001$),且生活照料对老年人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eta = 0.07, p < 0.001$)。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的使用提高了子女与老人日常线上沟通的频率,加强了情感维系,从而导致线下的日常照料减少。

表 2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分析($n = 6081$)

变量	(1)		(2)		(3)		(4)		(5)		(6)	
	情感慰藉		幸福感		经济赡养		幸福感		生活照料		幸福感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互联网使用	0.09***	3.46	0.19***	5.50	0.51***	6.27	0.17***	4.32	-0.10***	-4.35	0.21***	5.40
家庭代际支持												
情感慰藉			0.07***	4.01								
经济赡养							0.04***	5.73				
生活照料											0.07***	2.66
性别	-0.02	-1.18	0.21***	12.34	0.01	0.18	0.23***	12.19	-0.06***	-5.47	0.23***	10.99
年龄	-0.00***	-3.04	-0.00**	-2.47	0.00	0.17	-0.00***	-2.77	0.00	1.35	-0.00**	-2.29
控制变量												
婚姻状况	0.09***	6.09	0.10***	5.11	0.23***	5.04	0.09***	3.97	-0.11***	-8.25	0.07***	2.80
自评健康	0.00	0.40	0.24***	29.47	0.03*	1.82	0.24***	26.64	0.06***	10.07	0.23***	24.16
收入	0.00	0.22	0.02***	7.20	0.02**	2.19	0.02***	7.32	-0.01***	-2.65	0.02***	5.72
居住地区	-0.08***	-6.03	0.18***	9.99	0.21***	5.00	0.16***	8.13	-0.07***	-5.61	0.16***	7.43
常数项	0.72***	9.37	2.04***	19.89	7.83**	33.71	1.81***	14.68	0.70***	10.21	2.20***	18.23
R-squared	0.03	0.22	0.05	0.23	0.08	0.22						

使用 Bootstrap 检验法,重复抽样 1000 次对互联网使用的直接效用和间接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3。从所得结果来看,情感慰藉、经济赡养和生活

照料 3 个的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都没包括 0,说明它们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表 3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n = 6081$)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p
互联网使用 - 情感慰藉 - 幸福感	0.006	0.002	0.002	0.011	0.007
互联网使用 - 经济赡养 - 幸福感	0.02	0.005	0.01	0.03	0.000
互联网使用 - 生活照料 - 幸福感	-0.007	0.003	-0.014	-0.001	0.033

4 讨论

该研究使用 CHARLS 2018 年数据对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并基于家庭代际支持理论试图探究其中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老年人幸福感。(2)家庭代际支持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其中情感慰藉、经济赡养呈现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能够增加老年人幸福感,但家庭代际支持中的日常照料的中介效应显著为负,即互联网使用降低了子代的日常照料,进而降低了老年人的幸福感。

4.1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这一研究

结果与以往研究成果相符(丁雨桥,温勇,2022)。这一结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互联网可以突破时空约束,增加了老人与他人、社会、子女等的沟通及时性和互动灵活性,扩展其社交网络(赵一凡,2021),增进社会支持水平,拉近了其与社会团体、兴趣组织等成员的关系,进而降低了老年人的孤独感和疏离感(Khalaila & Vitman - Schorr, 2017),增强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任感及归属感(赵波等,2022),促进个人身心愉悦,从而提升老年人群的幸福。二是互联网使用拓宽了老年人获取与医疗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信息咨询的渠道,增加对老年病、常见病和基本健康防护等知识的认知程度,提升其自我诊断、自我健康感受能力,减少慢性疾病数

量(Chopik, 2016),有助于提升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自我评价,增强身体素质,进而增加其幸福感。三是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降低老年人对关注的经济社会变化、休闲娱乐(Cilesiz & Ferdig, 2003)、消费促销等信息的搜集成本,增强老年人信息获取能力(甘小立,汪前元,2021)和参与感,促进老年人幸福感提升。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使用也可能减少老年人面对面交流机会以及户外活动时间等,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合理规范使用互联网是普遍共识,互联网在改善老年人生活状态、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增进老年人幸福感等方面已经释放出巨大的正向作用。

4.2 互联网使用通过家庭代际支持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还通过家庭代际支持的中介作用影响老年人幸福感,该结论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宋璐,李树茁,2008)。互联网使用的增加,打破了子代与亲代间的空间距离,赋予人际连接和代际沟通新的维度,能够第一时间传递和分享来自子代的喜怒哀乐,促进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线上沟通交流频率(Xu & Huang, 2020),使老人获得更多情感慰藉,降低孤独感;基于互联网的线上支付、转账缴费等方式能够增加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赡养,从而减少了老年人面临的经济约束,进而有效提升其幸福感(吕明阳,张益,2022)。而反观日常照料,互联网使用减少了个人与家庭面对面交流机会,可能会导致子代对亲代日常照料降低。互联网圈子的形成,不再只是以内容为主体的中介化传播形态,而是通过连接承载与建立新的社会化传播场域,其巨大的影响力尤其体现在它对社会关系的重构之中,互联网不仅带来了人际交往结构的变化,也为洞察媒介使用背景下家庭代际支持变化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解释性依据。

基于本文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启示:一是持续提升互联网在老年人群的普及率。一方面是我国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爆炸式发展,健康、娱乐、社交等咨询信息快速传递;另一方面是针对老年群体的移动终端和互联网服务产品相对短缺,致使老年人互联网应用水平普遍偏低,制约了互联网提升老年群体幸福感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应进一步强化面向老年群体的互联网应用服务及产品开发,持续推进智慧养老工程,切实提升老年人互联网可得性和普及率,夯实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的基础保障。二是切实发挥互联网在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的正向作用。家庭代际支持是我国养老模式的优良传统,也是促进家庭和睦、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有效手段;而互联网应用水平的提

升,使得家庭代际支持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能够使老年人更真切感受到来自子女的精神慰藉及物质支持,进而促进其幸福感的提高。因此,应针对不同家庭人口特征、所处区域特点等,研发面向不同家庭代际支持需求的互联网终端服务产品,充分发挥互联网使用对家庭代际间的情感慰藉、经济赡养的促进作用,提升家庭代际互动性、连通性和交互性,进而提高老年人幸福感。

本研究呼应了当下社会面临的养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但本文研究也不可避免存在不足:首先,本文使用的是2018年截面数据,并没有使用面板数据,分析只停留在一个时间节点上,难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持续作用和动态发展,因此后续研究需要采取更长时间的跨度,使用面板数据进行深入研究。其次,本文的中介分析选用了代际支持进行研究,而老年人的幸福感是一个受各种因素影响的主观感受,因此,后续研究还需要从多维度出发探究互联网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路径机制。

参考文献

- 蔡蒙.(2006). 劳务经济引致下的农村留守老人生存状态研究:基于四川省金堂县竹篙镇的实证分析. 农村经济, (4), 118-121.
- 丁雨桥,温勇.(2022). 互联网的使用对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 心理学探新, 42(1), 69-75.
- 甘小立,汪前元.(2021). 互联网使用能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吗? 基于信息获取视角的一个实证检验. 产经评论, 12(4), 129-142.
- 侯建明,张培东,周文剑.(2021). 代际支持对中国老年人口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人口学刊, 43(5), 88-94.
- 黄文杰,吕康银.(2020). “退而不休”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税务与经济, (3), 22-31.
- 贺志峰.(2011).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人口与经济, (S1), 1-3.
- 李竞博,李怡.(2024). 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基于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分析. 人口研究, 48(2), 60-74.
- 罗明忠,刘子玉.(2022). 互联网使用、阶层认同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中国农村经济, (8), 114-131.
- 吕明阳,张益.(2022). 使用互联网会激发青年的创业意愿吗?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当代青年研究, (5), 83-91.
- 吕如敏,赵瑞芳.(2015). 代际关系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兼论老年人在代际交往中的利他性. 荆楚学刊, 16(2), 47-52.
- 倪晨旭,王震.(2022).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

- 响. *人口学刊*, 44(3), 59 – 72.
- 聂建亮. (2018). 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吗? 兼论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8(6), 91 – 101.
- 舒纷纷, 同钰莹. (2017). 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再论“父母在, 不远游”. *人口研究*, 41(2), 42 – 56.
- 宋璐, 李树苗. (2008).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10 – 21.
- 田北海, 徐杨. (2020). 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吗?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4), 50 – 69.
- 唐金泉. (2016).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年龄组的差异性分析. *南方人口*, 31(2), 60 – 70.
- 温勇, 丁雨桥. (2022). 中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互联网使用影响分析. *人口与健康*, (4), 23 – 27.
- 王积超, 方万婷. (2018). 什么样的老人更幸福? 基于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用的分析. *黑龙江社会科学*, (5), 77 – 87, 160.
- 许新鹏. (2017). 代际支持、身心健康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社会工作与管理*, 17(2), 17 – 25.
- 邢占军. (2011).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社会学研究*, 25(1), 196 – 219, 245 – 246.
- 赵波, 李娜, 岳中刚. (2022). 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人口与社会*, 38(3), 24 – 35.
- 赵一凡. (2021). 社交媒体语境下网络舆论生态变化及分析. *今传媒*, 29(9), 35 – 38.
- 张敏杰. (1994). 中外家庭养老方式比较和中国养老方式的完善. *社会学研究*, (4), 85 – 92.
- Adhikari, R., Jampaklay, A., & Chamratrithirong. (2011). Impact of children's migration on health and health care – seeking behavior of elderly left behind. *BMC Public Health*, 11(1), 1 – 8.
- Chopik, W. J. (2016). The benefits of social technology use among older adults are mediated by reduced lonelines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9(9), 551 – 556.
- Cong, Z., & Silverstein, M. (2008). Intergenerational time – for – 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 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5(1), 6 – 25.
- Cilesiz, S., & Ferdig, R. (2003). Expressiveness and conformity in internet – based polls. *First Monday*, 8(7), 16.
- Khalaila, R., & Vitman – Schorr, A. (2017). Internet use, social networks, loneliness,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adults aged 50 and older: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7(3), 479 – 489.
- Xu, Y., & Huang, Y. (2020). Chinese middle – aged and older adults' internet use and happines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loneliness and social engag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40(12), 1846 – 1855.
- Yuan, H. (2021). Internet use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older people in Shanghai,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household income. *Aging & Mental Health*, 25(4), 661.

Internet Us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Older Adults' Well – being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ARLS Data

Ren Hongjie¹, Li Huishang¹, Hu Chenpei², Feng Yiyu³

(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0081; 2.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3.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Abstract: The Internet is accelerating its penetration into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subconsciously influencing the lifestyle, behavioral cogni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the elderly and hav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sense of well – being. Based on this,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Aging Tracking Survey (CHARLS), the happiness levels of a sample of 6,081 older adults were portrayed to test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older adults' happiness and its mechanism pathways. (1) Internet us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ntributes to the level of well – being of older adults. (2)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well – being of the elderly, in which emotional comfort an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can enhance the well – being of the elderly, while daily care is reduced by Internet use and decreases the well – being of the elderly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among the elderly be further promoted, that the level of intelligent elderly care and assistance for the elderly be raised, that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upport be effectively brought into play, and that the sense of well – being of the elderly be continuously enhanced.

Key words: internet us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he elderly; happiness; mediating effect